

J. E. D. HALL: LABOUR'S FIRST YEAR

工黨一年

費孝通 史靖合譯 生活書店發行



第一章 不流血的革命

但是這是可怕的。他們已選出了個工黨的政府了，這個國家是受不了的。

——Francis Noel-Baker 所引 Lady in Claridges
我宣稱我們真是個國民的政府。我們是國民生活的全面，這是空前的。

——Arthur Greenwood

一九四五年英國的普選和當時歐洲大陸上政治的擾動，以及和英國以往歷屆的普選相比，這次很可說是極有秩序的。在競選時固然不免有些刁難的詰辯和誣害的標語，但是這些對於有經驗的人看來是很平常的。選民在甯靜和思索的態度中投他們的票；除了邱吉爾的閃電旅行外，這次選舉裏沒有示威，沒有戲劇性的節目。邱氏的旅行也祇引起他個人名望的煊赫，無關政黨政治。

可是在七月二十六日，英國却突然的醒覺：一次重要的革命却已降臨。選舉結果揭示了工黨競選人像潮水一般的中選了。這事實把工黨以超過所有其他政黨總數一四八票的優勢送入威士敏斯特的國會巨廈。過去五十年內這個年輕的政黨在國會裏從兩席開始增加到了三百九十三席。有七十九個選舉

區在這次選舉中初次選中工黨人物作議員，同時經過長期執政的保守黨在這次選舉中却損失了一百八十一席。

這次政治局勢突變的原因並不是容易分析的。有些人認為這是因為保守黨太自負也太把穩的倚靠少數傑出人才的名望，和邱吉爾在戰時輝煌的成就，因之忽略了充實和宣揚他們的政策綱領。有些人認為若是工黨不抬出平穩持重的艾德禮，而以咄咄逼人的貝文或摩里遜，或是堅強不阿的克利浦斯作領袖，說不定工黨會失去中產階級的選票。事實上，他們這些人物是一個班子，而且背後還有一個良好的組織和周密的行動計劃支持着他們。英國人民早就聽熟了社會主義的治國方略，可以糾正當前的許多弊病，但是這些方略一直沒有試過。在一個經過了戰爭的磨難，渴望改革的新國家，這些是對工黨有利的條件。如果保守黨不自欺欺人，他們實在沒有什麼顯著的新方案有別於他們傳統的漸進和改良的政策。

戰爭結束的時候，英國普遍的要求改革，有人認為是和厭戰心理有關的，而且也認為這是島國的特性。雖則他們已經碰着飛彈，聽到原子彈，但是英國人對於海峽足以阻止侵略的信心還是很深。在大陸上的那些國家不可能有這種信心的。和戰時的敵人接壤的人民，不會這樣容易感覺到安全的，他們時常對於戰時有功的文武領袖繼續加以擁護，用高官厚爵報酬他們，雖則這些人在和平時期已經沒

有多大用處了。在英國却相反，戎裝卸下，戰爭被忘記了，可能就這樣使邱吉爾和他的保守黨悄悄的下台了，雖則邱老的名望並沒有一點降落。

保守黨的失敗和他們這次競選的策略也不無關係。那時人民都存着英國前途的全面問題，而保守黨却採取側擊戰略，集中了不少時間和精神去攻擊拉斯基教授，他們想藉口拉氏以工黨執委會主席的地位在政府之外操縱英國政治，有類蘇聯，跡近獨裁加以攻擊。邱吉爾在攻擊工黨時所說的也超出於常識的限度，他指斥工黨的政策是『和全能主義絕不能分開的混結在一起』，又說：『工黨會使用特務。』很多選民實在不易相信這些話，而且他們認為邱老用這些話來恫嚇人民就表示英國人民決不會接受這一類東西的，沒有任何政黨真的敢於這樣做的。

不論工黨競選勝利的原因何在，在威士敏斯特的巴力門內觀察的人看來，這次選舉所帶來的變化是近於不可相信的。八月一日新國會選舉議長時，舉目一望，到處都是些新面孔，零零散散的夾雜着一些熟面孔。站在政府這一面的議員摩肩接踵，擁擠不堪；在通路那頭，不少人竟擠出了欄桿。老資格的議員一不經心就會走錯地方，保守黨的議員很久就養成了走到人多那一面去的習慣，可是現在人多的方面却正是反對他們的工黨了。祇有自由黨還坐在他們的老位子裏，雖則數目却已少了一半。還有三個獨立工黨的議員坐在原席，自認為反對黨，而這次却和保守黨為伍了，那真使邱吉爾哭笑不

得。他們在這位置上已經坐得很久了，似乎認為已經有了久佔的權利。

第一次集會裏精神很高漲。工黨這面的老朋友們得意洋洋的互相道賀，保守黨那面拉着手互相安慰，幸未落選。訕笑的聲音從多數的一面投向零落的保守黨，他們祇能以殉道者的自慰心情來承受，一直到邱吉爾進門時，空氣才轉變。保守黨的議員們全體起立，歡呼雷動：「他是一個好傢伙！」他們人數雖則不多，但是聲音却很響亮。工黨這一面很冷靜的坐着不動——除了一個例外。愛玲·魏金生的歷史感超過了她的黨見。

緊接着這個很不合傳統的示威場面，工黨議員也不甘後人，來了一套更為空前的示威行動。當保守黨為邱吉爾歡呼剛完，大家就座的時候，那個矮小的喬治·格里夫斯 George Griffiths 忽然站了起來，舉起兩臂，高聲唱起『紅旗』歌來了。起初有一點來得唐突，但是唱的人却愈來愈多了。前排的議員有一點不知道怎麼辦好。有幾個閣員，似乎置身於黨會裏，也站了起來，可是一站起來想着這是巴力門，重又坐了下來。

這一陣狂歡，雖則有一點不太莊重，可也是人情之常；過後，這新的國會開始它嚴肅的工作了。八月十五日國會正式開幕，剛巧逢着日本的投降。這早晨，下院在聖斯坦芬堂 St. Stephen's Hall 議會——離上一次國會在這地方開會剛是一百十一年。下午，他們回到自己的議場，聽首相宣布日本投

降。接着到聖瑪格蘭教堂做禮拜，重新回來通過給英王勝利賀電。

所以，就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的那一天，英國開始他們社會主義的試驗了。工黨上台得一點都不拖泥帶水。他們有着超過對方很大的多數，他們想通過什麼法案都沒有困難。他們的困難是在英國處境的嚴重，對此沒有人能責備他們。在這嚴重的處境對面是英國復興的機會，如果工黨不能把握這機會，則近於一千二百萬的選民決不會放過他們的。

第二章 面對着國際的將來

這個國會是要結束戰爭。我們相信英國的領導作用可能是決定將來世界運命很重要的因素。這是一次人民的戰爭，我們將要造下一個人民的和平。每個國家裏普通的人民現在都已相信每一國所關切的利益並不是個別的，而是和其他國家共有的。他們相信一國的繁榮包括着別國的繁榮。他們相信戰爭是無用的，浪費的和不好的。他們相信戰爭可以在這一代中結束，如果我們願意這樣做。英國現在的政府也是這樣相信，就在這個精神中，我們將要開始工作。

——Philip Noel-Baker

經過了不少儀式和程序上的事務，國會終於在八月十六日開始工作了。可是還有一個小節目——像是吃飯前的感謝詞——得費一點時間。這是爲防止祕密法外行爲的法案初讀。依 Sir Alan Herbert 說這是最出於慣例的程序。『這個法案並沒有任何議員提出，又沒有印出來，連在圖書館裏都找不到的。』但是，他解釋說，這是有歷史性的表示，使大家不忘記下院有權可以在政府提出議案之前隨意討論任何問題。這個法案不過是一種象徵性的作用。

立法機關獨立的姿態表示過了之後，下院就開始辯論『國王訓詞』。國王訓詞並不是真的係國王

的旨意，而是在朝政府施政的方針，借國王的口說出來的罷了，在普通情形下這場辯論，關涉全部政策的基本綱目，常是包羅而精采的，而且時常要辯論十天到十二天。但是這次却並不在普通情形下。一則是和平的突然降臨，二則是政權的突然轉移，使這習慣的程序出了常軌。經了多年的聯合政府，一時轉不過來，不容易恢復黨爭的氣氛。在同一內閣裏多年合作過，而且很和氣的閣員們，突然發現現在站在相反的立場，在國會裏面對面的坐着了。

並駕齊驅的關係，在英國的精神裏，不能就這樣毫無儀式的分道揚鑣。所以艾德禮，現任首相，發表了一篇感激邱吉爾的演講，很有禮貌的把過去的關係拆散了。『在我們歷史上最黑暗和最危險的一刻，』他說，『我們的國家找到邱吉爾這個人，他表現出超人的勇敢和堅決，絕不服輸，這精神鼓動了全國的人民，不分男女，他從政府機構裏放射出一條熱力的巨流，衝盪這個國家的生命。他在歷史上的地位是穩定了。』

開場這四天，正如邱吉爾所說的，是『毫不刺人的場面』。雙方客氣的原因還多。在野黨還沒有安排他們的政策，而政府方面，雖則對於目標認得很清楚，手段上也沒有成熟。而且，一半的演說是從後排發出來的，都是些處女作。（在下院重要的議員坐在前排，新入院的和不活動的坐在後排。）巴力門裏的傳統是相當講究禮貌的，凡是一個新入國會的議員，初次開口演說時，一定得挑一個沒有

多大爭論的題目，別人也不去攻擊他的。這次新人物數目上太多，這類演說所佔時間也較長，以致辯論大爲減色。但和以往比較已略有出入。聽者固然還是守着傳統，不出一詞；但是有不少初出茅廬的『孩子們』却一開口就不太模稜兩可，光芒畢露，挑釁尋事。可是辯論時間有限，沒有人能從容說法，尋根問究，牽引出嚴重的爭執來。刻板的記錄裏做不出文章；甚至連向非洲土人輸出穀酒的案子都沒有機會發揮。

原子彈的黑影籠罩了這場辯論。戰爭是結束了，但是前途茫茫，一片疑慮。感謝國王訓詞提案的動議和附議的兩篇官樣文章講完，邱吉爾以反對黨領袖的地位，接着在他的演說中提到了原子彈。他說，有人認爲這原子彈根本就不應當使用。他並不能贊同這見解。『六年的全面戰爭已使他們相信假如德國和日本發明了這新武器，他們一定會以最殘酷的方式用它對付我們的，』他說。『我很奇怪通達的人竟會有這種見解：甯可犧牲百萬美國士兵和二百五十萬英國健兒的生命去在激烈的和屠殺性的爭奪中進攻日本，而不願用原子彈。後世會批評我們的決斷是否正確，我相信若是他們那時如果生活在一個幸福的世界裏，不聞戰爭，有的是自由，他們決不會指斥我們曾在這恐怖和殘酷的時代受盡痛苦去爲他們爭取幸福的。原子彈帶來了和平，但是祇有人才能維持這和平，所以，我們應當把這，不但威脅文化，而且威脅人類的武器加以保守。我們追求的歷程已帶我們到了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一

刻；不分等級，全體人民必須爲這無上的機會而努力，片刻不能虛度，寸陰不應虛擲。」

艾德禮對這問題作着保留的態度。他同意戰爭的預防，在這新的破壞力量之前，是文化生存所賴，但是他這時對於如何管制的問題並沒有聲明。至於原子彈必須在謀全人類的利益而加以管制，不應當用來剝削別人的原則，那是毋容多說的。

坐在後排的議員們却依他們政治的見解來認取這新問題。工黨的 Middleton 太太懷疑在男女老幼的衣食住行够不上文明的程度時，維持和平的機構是否足以維持和平。「我們無法以原子彈的威脅來建立和平，因爲若是人們生活在這種程度上，他們怎麼會怕死呢？他們生着並沒有樂趣！」自由黨領袖 Clemen Davies 認爲原子彈已開啟了一個新的世紀，在這新世紀裏以往認爲是理想主義的現在已成現實主義了。詩人所曾預見的「人類的國會，世界的聯合國」已經近於事實了。保守黨却看到了這問題比較更切實的一方面。Captain Gammans 關心到英倫三島的處境，已成了世界上最受不起打擊的地方，今後我們自己的安全必需是我們外交政策的基礎。「我們不必管別國政府是左傾右傾或是中間，也不必管是紅，是粉紅，或是黃的。我們關切的是那個政府是否有助於我們的安全。」獨立的議員中，Vernon Barlett 認爲安全理事會中決不能有兩個永久會員保持着某種秘密而不肯給另外的會員所共享，這樣的安全理事會是不能維持下去的。W. J. Brown 感覺到牠已面對着一種力量足以使他

們對內對外的政策都過了時，這力量可以使人類能共享富裕，而不必共享窮困了。

原子彈雖則籠罩着前途，但是並不能壟斷巴力門的注意。戰勝國之間列強的關係，以及歐洲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的嚴重局面——一切戰後的問題——都須加以正視。這次辯論中在有關外交的問題上却表現出一致的精神。在朝和在野兩黨並無不同的政策，雖則各有偏重。

邱吉爾的演說又表現了一次他著名的詞藻。一個失去了頭的德國已經在征服者的掌握之下了，他說，但是我們不能讓德國的羣衆躺在我們的手上。無數德國人，本來住在新波蘭的，現已無所歸宿。他們到那裏去了？他們的運命怎樣了？稀少的消息已經洩露，大規模的悲劇並不是不可能正在分隔歐洲成孿生兩枝的鐵幕背後進行着。

差不多在巴爾幹所有的山地，混亂，沒有秩序和戰鬥狀態中的區域裏，共產黨已獲得了獨裁的政權。在這些國家，既經戰禍，可能在相當時間中需要專制的政府。不這樣就是無政府。無論如何，這種政府會統治了不少國家。現在却是說出來的時候了。如果這些政府還想在人民自由選舉的方式之外去繼續執政，那就可惜了。另外一方面說，想去干涉別國的事也是錯誤的，「去瞭解別國的內政是不可能的，」他說。他又用了惋惜的眼光，從他眼鏡的上邊投射到他對面的工黨坐位，加了一句「要瞭解我們自己的內政也够困難的了！」

邱吉爾的演說其實可說是他在國會中當戰時領袖時所作許多動人演說的最後一篇。當艾德禮首相接着他發言時，歷史翻過了一頁。戰時的火藥味兒還可以從邱吉爾的聲音中聞得出來，但是艾德禮的口上却沒有了。堅定代替了凶猛，確切代替了詞藻，艾德禮承認在歐洲有不少政府並沒有民主的基礎，但是可以樂觀的希望這些國家的政治會容易的，迅速的，平穩的安定下來。其中有很多，即在平時，他們的政治也從沒有容易和平穩過。

國際局勢的詳細說明是出自新外相貝文。這位魁梧，銳利，爽直，和富於人性的外相看到歐洲的雙重困難。第一是這些國家的人民在戰時曾經養成了反抗權力的習慣，很難使他們不加考慮的接受法律和秩序。第二，淪陷時期會獎勵他們減少生產以阻礙敵人的工作，現在突然要他們要緊生產，嚴守紀律了。從一種情勢轉變到另一種相反的情勢需要寬容，忍耐和決心。

歐洲成千成萬流浪的人又是一個嚴重的問題。自從解放之後，他們變成了遊牧性質的人了，到處流浪，竊盜食物，凶殺姦淫，沈溺於反社會的行爲。這混亂的局面正是貪圖權力的人的薙獵之場；想要恢復秩序，重建權力，服從法律，從事生產，真是談何容易！在開始時想由人民自由選舉他們的政府也許不可能，但是在開始時也不應該讓他們以暴易暴，以一種獨裁代替另一種獨裁。

當這被戰爭打擊得昏迷了的世界開始醒覺時，列強的主要責任是在維護和平，並不是左右別人。

他們應當負起責任來創立一種秩序：每一個國家，不論大小，不但都能求自身的國泰民安，而且都能有貢獻於整個人類的幸福。

「兩次大戰之間的幾十年中，我們已習慣了一種惡性循環；沒有安全不能繁榮商業；商業不繁榮，安全也靠不住。現在最後我們已找到安全之道了。這該是打破這惡性循環之時了。我們一定得有效的消除社會的不平等，消除貧困和匱乏，使我們從軍事上獲得的安全能擴充成更大的安全，更大的安全能促進更大的經濟繁榮。因為這個緣故，所以政府主張世界經濟復興是我們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標。」

在重要的問題上可見兩黨的見解並沒有多大差別，事實上是保證了英國外交政策的不變，所不同的是保守黨偏重民主性的自由，工黨偏重經濟復興，兩條道路其實都是通向安全。就是在次要的問題上，兩黨的歧異也不太顯著。工黨議員不太滿意對希臘政策的繼續。Michael Foot 斥責擁護邱吉爾對警察政府的按語的保守黨議員。但是以兩黨領袖的態度說，對西班牙，對希臘，和對波荷等政策，保持着高度的默契，如影斯響。

惟一緊張的場面是有關於拉斯基教授的，其實是內政重於外交。邱吉爾在競選時受了氣，這時發作了。他說，拉斯基先生曾聲稱假如法國選出社會主義的政府，英國將要重提一九四〇年的英法合併

的方案。這個聲明是否受政府批准的？Fitzroy Maclean（保守黨）也站起來說，拉斯基教授把我們對美關係繫於美國金融家對英國社會主義試驗的態度。這是很危險的教條。這是說我們的外交政策將建立於變化不定的政治感情的沙灘上，而不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上。邱吉爾挖苦工黨，說他們發了拉斯基炎。可是這拉斯基炎却很受 Campbell Stephen（獨立勞工黨）的歡迎，他認為很多在政府一邊的議席中人物是靠了這發炎而當選的。

艾德禮首相似乎也有這意思，他很斯文的擋住了邱吉爾說：「這位先生（指邱老）知道，拉斯基教授和他很相同，具有一套沸熱的詞彙，而且有時不免有一點衝動。他有他發表他意見的權利。但是政府的政策是由閣員規定的，所以任何報紙，任何別國政府，或任何人，不這樣想法，就犯了錯誤。」

這是巨頭間關於這問題最後的一次交鋒。在後排議員間却還繼續了一兩個月，一直到競選時所引起的熱潮退了之後，才不再提到拉斯基。

第三章 面對着國內的前途

在我們面前是一個爭取和平的戰役，其嚴重性並不低於我們過去六年所遭遇的戰事。今天，我們的戰略將開始付諸實施，今天我們已開火，今天很可以說是新英倫之役的D——D

A Y

——Major Freeman

「我們必須明瞭，我們已經過多少困苦歲月，我們還將要面對着同樣困苦的日子。若要通過這一段困苦的日子，我們所需的努力，不自私，和耐苦的程度絕不能少於我們在戰時所表示的。我知道這對於已經工作得這樣多，這樣苦，磨難得這樣深的人很難出口的，但是我若是不能在全國的同胞面前完全坦白的把實情相告，那就將是我的錯誤了。」艾德禮也知道他這誠實的聲明將和競選時那些迷人的演說，以及和邱吉爾那種繞梁的聲音和關說的姿勢成一種對比。邱老那時剛在朗頌政府的大好機會。他說：「自由和繁榮，這些是我們的目標。我們一定要設法分享我們的幸福，不是我們的憂慮。」艾德禮却小心的拒絕任何過甚之詞，他的眼睛看準着日漸困乏的現實——和平的「血，汗，眼淚和勞苦。」

政府政策的底子裏是他們決心想避免一九一四——一八年的錯誤。復員是其一端。艾德禮認爲立刻解散軍隊，沒有武力在握而想去防止歐洲的混亂，是愚蠢的。但是復員的速率却須增加，滿服役年齡的青年仍須繼續入伍，在兩個月之內，在軍事工業中解僱的人數即將超過一百萬。市場上對貨物和服務的需要極大，祇有構成一個有效的組織去開發所有的資源才能得到足夠的供給。若是允許稀少的貨物流到最高出價的人的手上，物價即將上漲，有限的資源即將不顧國家的利益而浪費了。結果是通貨膨脹。『這個政府已經決定不能有通貨膨脹。我們已決定在戰時會成爲我們國家生存基礎的公平分配物資的原則決不放棄。我們需要全體人民的支持。他們可以放棄任何統制，但是決不能放棄自制的能力。』

從戰爭轉變到和平包涵着金融和商業的問題。這裏，首相力言說，不論英國怎樣能在自己土地上培植糧食，英國人民若要吃得飽，還是需要向外輸入可觀的數量。遲早英國得碰着這事實：除非英國能輸出，英國不能輸入的。這個經濟的處境引起反對黨 Lytelton 的檢討。他是戰時的生產部長。他舉出數字說，英國的輸出從一九三八年的四七一百萬鎊降到一九四四年的二五六百萬鎊。在數量上說，以一九三八年作爲指數一〇〇，則一九四四年祇有三一。其他保守黨員又補充說，英國已喪失他們海外的投資，以前英國輸入的三分之一是以海外投資的利息支付的。英國現在所欠英鎊集團的債已

在三千至四百萬鎊之間，相等於戰前八年的輸出總額。若是英國的輸入要達到一九三八年標準，必需輸出一千二百個百萬鎊。Lytelton 的結論是英國必須提高現有增加戰前貿易百分之五十的目標，他緊接着說輸出這一門商業最不適宜於政府的統制和干涉。

財政政策的堅決的聲明是出自財長唐爾頓 Hugh Dalton。他堅持金融應當和原料及勞力一般用來開發國家的資源。政府的用意是在實行借貸的優先原則，根據對於國家利益的輕重規定各種工業如銅，鐵，棉紗等復興借款的先後和多寡。

簡單說來，一般的政策是：復員速度必須配合於戰時工業轉變為平時工業的速度。在這轉變過程中必須防止通貨膨脹的打擊並依國家的利益受政府的管制。輸出品和內銷品的比例將以原料，金融，和勞力的管制加以分配，使合於國家的利益。

復員，貿易，金融，工業之外還有若干國內的問題，最嚴重的是煤，因而又引起了國營的主要爭點。邱吉爾說：假如國營真是獲得最大生產，最低成本，最快能實現的辦法，他個人對這計畫會同情的——但是這是個纖弱的『假如』。其他保守黨議員却並不如此溫和。Ropner 說爲了政治的目的，那些領導礦工的人，堅決的不讓私營制度有所成就。這是說私營礦業的生產低落的原因是工黨在作祟。David Eccles 的責難採用着比較合理的論調。他認爲沒有任何通達的人會反對公共企業的國營